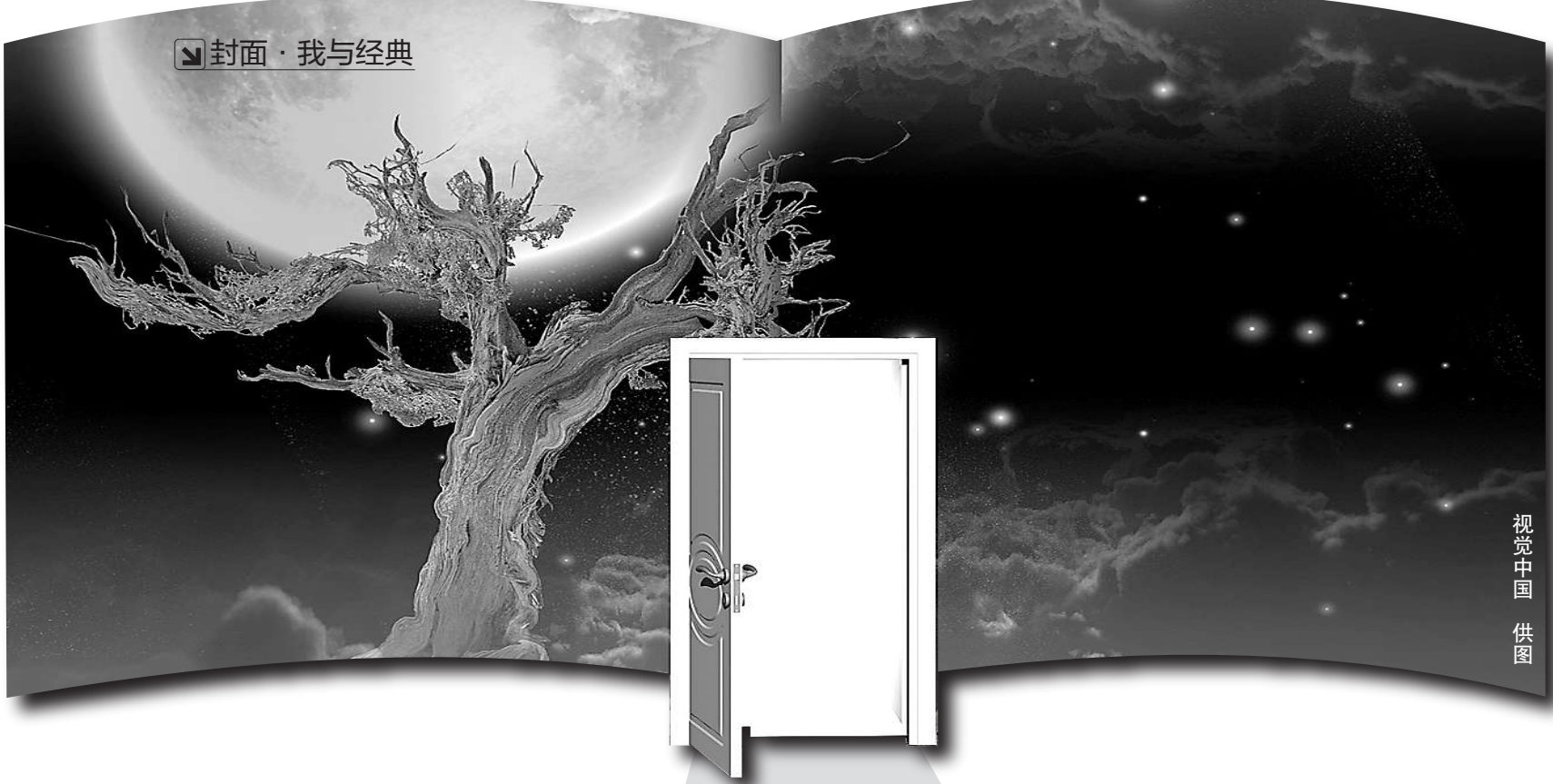


封面·我与经典



# 人生逆旅中的一束暖光

邱磊

1919年5月3日,上海,细雨蒙蒙。刚刚来到中国第四天的杜威为千余青年演讲,不料次日五四运动爆发。这场青春之名席卷华夏的民族自救,竟以“偶遇”的方式与他邂逅。我爱读这场“偶遇”,在《杜威家书》《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等著作中,均能温暖地与之相照。像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样,这场“偶遇”带着命运的投射与晕染,改变了杜威,也改变了中国。

我柳暗花明的教育人生,也因缘际会于“偶遇”——书中的杜威,跃然而出,欣然在侧。让一切都美好地自然生发。

## 1 “教育随时都是自己的报酬”

初读杜威,是2011年在王丽琴博士的引荐下,参加了阅读小组。捧起《民主主义与教育》,发现它如同一堵叹息之墙,巨硕、厚重、冷峻,拒绝轻佻或献媚的世俗骚扰。那时候,我正在带高三,兼着校团委的工作,披星戴月,任务繁重。相比于劳形之困,对机械训练的厌恶,对效率至上的角逐,更叫人窒息。大早望云霓,任何一个年轻人都渴望改变。但晦涩难懂的杜氏著作,每日浅尝辄止,内心颇多抗拒。恰其时,有关学校“可能拆分”的消息传来,一时人心惶惶,前景黯然。也许是命运的安排,突然听到一位老主任鼓气道:“大家不要多想,杜威说过,支配想象的是未来,而不是过去。黄金时代是在我们前面,不是在我们背后”。咱们做好自己的事情最重要。”

一语惊醒梦中人。“杜威”的名

字,明明熟悉,却又那么陌生。想起《道德经》中说“中士闻道,若存若亡”,自己之前就是这样的状态,将信未信,空有读书之形而已。实际上,走近名著并不是件一蹴而就的事情。其自带的“学问结界”,如知识门槛、术语壁垒、文化隔阂等,阻退了许多人。但奇妙的是,柳暗花明的强心针,有时只是“偶得”的一句话而已。于是,再次翻阅时,便有了由衷的敬意:“我们并不生活在一个固定不变的和完结了的世界,而是生活在一个向前发展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展望未来,而回顾过去的价值在于使我们可靠地、安全地和有成效地应付未来。”

从此,杜威的声音在夜晚的卧读中,一遍遍回荡。向前,向前,永远向前!可是,路在哪里?1896年,杜威打造了自己的实验学校,

在建构“微型共同体”的理念下,他与一群或大或小的孩子“嬉闹”在一起。煎鸡蛋、修木凳、纺纱线,甚至合力搭起了木屋,不亦乐乎。这所学校虽只存在8年,却催生了伟大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每念至此,心潮澎湃。我渐渐萌发建构“师生共同体”的念头,并竭力尝试:在凌宗伟校长的支持下,办《心智家园报》,以心理健康为支点,为孩子们提供精神栖息之地;创校刊《今天第二》,以文化濡染之力,提倡“慢学习”“慢生活”,以抵抗效率主义。我召集语文组、历史组、生物组的青年教师,为孩子们编写故事、诗歌、谜语,以杜氏的温暖共情,书写个人的教育理解与实践。

美国学者斯普林格在总结西方的教育哲学时,喟叹每个人的脑袋中都装有一个禁锢思想的“轮子”。

正是这个“轮子”定义着真善美、假丑恶,人们却浑然不觉,奉为圭臬。但杜威偏偏要将之打破,喊出“教育随时都是自己的报酬”。进一步有进一步的欢喜,他用个体的努力冲破旧俗的桎梏,并鼓舞后来者。

阅读让我从中汲取智慧,建立起一个教育学的参照标准、养成了一种教育学的敏感。比如,对每一节课,均有观察与复盘,考虑得失;对每一次动态生成,均有“课感”,拿捏得当。我的教学设计,从接触杜威开始,就考虑整本书、整套学科体系的综合运用。近年流行的“整本书阅读”“大单元设计”等,其实并不新鲜。日拱一卒,改变自己,改变孩子。5年的流光岁月,终于让一所曾走在悬崖边上的学校,上下一气,迎来新生;在与杜威的“偶遇”中,渐渐活出了色彩。亲眼见证这一切的我,与有荣焉。

## 2 “教育的重心在于各门学科的文化”

专业是教师的安身立命之所。我自小喜爱文史哲,师范专业为地理。这门课的特点是文理兼具,时空并一。可以说,凡是地球上的事情,都可以用地理的眼光来看待之,研究之,笃行之。或许依旧是“偶遇”,作为哲学家的杜威,亦钟情于地理。凡到举例,常用地理为证。他深情地写道:“日光,风,溪流,商业,政治关系,它们从远处来,把思想引向远处去。追踪它们前进的路程,就是扩充心智。”

地理的内容,芜杂庞阔,无论师生,都难免陷入琐碎的日常拉锯中。我在“把思想引向远处”的求索中,慢慢悟出:需要找到一个核心,以统摄地理的自然性与人文性。另一方面,对高中生而言,“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的古训并不适用,“熟知却非真知”才是众生陷入困境的症结。

两大难题,交织缠绕,一时苦闷。杜威一直强调教育即经验的改造,我念兹在兹,始终得不到抓手。一日见他在《民主主义与教育》第十六章写道,“教育的重心在于各门学科的文化”,恍然联想起“以文化人”不就是核心吗?地理的文化,几乎涵盖于中华文化。以典籍看,《山海经》《禹贡》《水经注》乃至《徐霞客游记》,无不承载了古代学者对山河大川、气象气候、地形地貌的描述,以及关于聚落、交通、民生的详细记录。另有汉字、诗词、地名、建筑等,天地壮美,闾巷至味,俱在其中。孩子们有了这些可感、可触、可验的“文化自觉”,岂不就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了?

这其中,汉字与地理的关联度极高。我的尝试由此开始。研究发现,汉字在形成之初,有七成为“象形

字”(类似水平高超的简笔画)和“表意字”(通过图形组合,表达特定含义)。其具有“一字一图”的鲜明特点,而地理一向将“图”视为“第二语言”,培养读图、识图、解图的能力,在潜移默化中的“说文解字”中即解决了。

以海洋地理中的“盐”字为例。繁体写作“鹽”,其中的“皿”代表煮盐的大盆或大锅,“鹵”指“鹵水”,即咸水,最常见的是海水,还有地下水、湖水等。“人”即艰苦煮盐、坚韧劳作的工人。“臣”代表大臣,引申为权力,暗示盐的开采、运输、销售,需在国家的严格控制下。一个小小的“鹽”字,穿越了历史,不但记录了盐的制造工艺,还暗藏着国家治理、世俗经济的法则。方寸之间的想象、推理与共情,让地理的自然性与人文性融合。

汉字是学习生活的必备工具,孩

子倍感亲切。2015年,我的“汉字地理”课一经推出,就受到热捧,遂扩充为“苍穹天文”和“地脉万象”两个专题课程,共30节课,涉及98个汉字。最热闹时,连语文老师也前来“蹭课”。3年后,我又搬来唐诗宋词,从古诗解析的角度解构地理。譬如,在“春风又绿江南岸”中解读季风,以“横看成岭侧成峰”诠释地形;一边吟诵“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一边在黑板上手绘喀斯特地貌。2021年秋天,原读本《古诗词中的地理课》顺利出版,赢得了不少小读者的欢心。

杜威以为,地理是“教育的沉积物”,文化恰是其底层逻辑。一场文化与地理的美妙联姻,在极大拓宽学科边界的同时,也把德育、智育与美育合为一体,形成学科育人的一道亮丽风景。

## 3 “所有的学习都是行动的副产品”

陶行知是杜威最得意的中国弟子之一,其名言“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改编于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的原话:“所有的学习都是行动的副产品,所以教师要通过‘做’,促使学生思考,从而学得知识。”读杜氏越久,越期待走出理论,“从做中学”,将其植根于广阔天地中,补益现实,推动进步。

2019年恰逢杜威来华讲学一百周年,中华教育改进社组织一批学人,在全国多地设立“杜威班”开班仪式。面对数百名高三师生,我以“杜威的学习观”为题,介绍《民主主义与教育》《学校与社会》等书中的先进思想;次日又作《杜威班创建方案》的主题报告,从教材教辅、教学环境、教学

方式、师资队伍等维度,设计了“杜威班”的创建内容。

班级建立后,问题也接踵而至,尤其是从校长到班主任、科任教师,并不能完全读懂杜威。于是,开展跨学科、长周期、低门槛的主题阅读,成了重点。我在学校与区里推进阅读,与区图书馆、区广播电台等合作,现场演讲、录制音频节目,分章节、辨疑难、突重点,把杜威的主要作品推到有兴趣的青年教师眼前,果然获得不少“粉丝”,大家为能找一本“为人生打底”的书而倍感庆幸。

阅读的激励,推动了“杜威班”的践行。学科实验、角色扮演、演讲辩论、户外运动……这些在传统高中中难以想象的“浪费时间”之举,渐渐被校长、师生悦纳。孩子们不再木讷,活泼而灵动,眼闪光,口含笑,胸怀志,青

春的朝气洒满校园的角落。在杜威的温情下,高考不再是残酷的零和互搏,而变成善意的增量相惠;人人做最好的自己,事事做最优的安排;他们朝着光明,永远向前。

“杜威班”的经验,让教育呈现出“柔软”的一面;而对近代中国教育史的回溯,则让我看到了“敦厚”的一面。“行以求知”的蔡元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胡适、“改良社会”的蒋梦麟、“砥砺研究”的钱穆等20余位名家,一个个围绕杜威,或亲或疏,或紧或松,或明或暗,形成了特色化的中国实践与文化表达。数年间,我拜访了南通张謇纪念馆、南京陶行知墓、苏州叶圣陶母校、上海胡适故居等地。走一路看一路听一路,历史的画卷正在眼前徐徐展开。回看历程,竟也啃读了50余本人物传记、代表作、地方教育史(志)。

这一寻访历程,不断加深着我对这片土地的感情:一个隔着半个地球的洋人,居然成了研究中国本土教育之人物、学校、遗迹的隐秘线索。东西方的文化合流,几经起落的时代裂变,透过暗黄的书卷与斑驳的院墙,倾吐着教育的真义。

读杜威,如饮一坛老酒,时愈久,香愈醇;如识一温润君子,交愈深,爱愈切。其人端坐于书中,外刚内柔,似冷实热,藏巧于拙。每一句有心参悟的读者,无不经过“知、行、意”的考验。但对我,杜威还有别样的意义:在人生逆旅的偶遇中,他投来一束暖光,照亮我晦暗的天空。我踟蹰反复,磕磕绊绊地寻到一扇微启的窄门,穿过它,终抵浩瀚而光明的人生新境。

(作者系中国教育报2019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主编《“偷师”杜威》《杜威教育箴言》等)

名师在读

# 经典的格局与气象

徐飞

清明假期,我读了两本书,其中一本是《培根铸魂话经典:王登峰、陶继新对话录》,这本书是去年陶继新老师寄给我的,当时只是粗略翻过,这次通读,便觉内心通透而平和。

王登峰先生曾为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曾任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他的谈话不可避免地带有学者气质和教育部官员的视角。而陶继新老师是著述等身的教育学者,在中国当代教育界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二人的对话可谓飞珠溅玉、满卷生香。

两人交流的核心话题是“经典文化与经典教育”。这个话题不算新,却永不过时,最重要的是与当下教育改革相契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将“文化自信”作为语文核心素养的四大内涵之首,而“文化自信”也是王、陶二人多次谈及的概念。二人的对话站位很高,以全球一体化视角思考文化多元与中国责任。

在谈及如何传承中国文化时,王登峰提出以习俗为载体的想法:“比如说中国的传统节日,像清明节。清明节要纪念先祖、先贤、先烈,是中国人对待自己先辈的致敬礼。敬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祖先,不仅仅是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凡是对这个民族、国家作出贡献的,都会受到全国人民的尊敬,这就是中国文化核心的价值理念。清明节的习俗一代一代传下来,这种理念就一代一代深入人心。”

除借助习俗传承传统文化外,两人谈得最多的是经典阅读,尤其是经典诵读。王登峰认为每个人在阅读经典的过程中都会感受到自身的变化,恰如“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阅读经典可以滋养生命,改变生命。陶继新则将阅读经典化作切实的行动,49岁开始背《论语》,50岁开始背《道德经》《金刚经》《心经》,61岁开始背《周易》……他不仅自己背,还引导两个女儿背诵《论语》,背诵经典,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汨汨滔滔地流淌在生命的长河中。

假期里精读的另一本书是杨九俊先生的《语文教学艺术论》。去年我参加一个语文项目,杨老师给参与研发的每位教师赠送了这本书。当时看到书名便觉特别亲切,因为这本书连接着我的青春岁月。

上世纪90年代,我在如皋师范读

大专班时,用的教材即是杨九俊老师的《语文教学艺术论》。这本书共十九论二十章,体系庞大,蔚为大观,几乎涉及了语文教学艺术的全部。翻找出当年的那本书,圈画批注的痕迹犹在,只是颜色变浅。这次修订,本书的体例未变,但局部做了修改,每一处改动都能见出杨老师教学研究的严谨。

这本书的大部分文字是杨九俊老师30年前所写,彼时他还不是苏教版高中语文教科书主编、统编高中语文教科书分册主编,但他在这本书里所展现的宏阔视野与一流才识,使这本书历经30年而常读常新。杨老师有深厚的美学造诣和教学功底,在论述时总能居高临下,要言不烦,同时这本书又脱胎于他在泰州师范教书时的讲稿,带有很强的实战性。顾黄初先生在本书初版的序言中忍不住赞叹:“每有所论,都在‘艺术’的层次上展开,思路既开阔,又始终不离全书主旨;每有所论,都伴之以丰富的文例、教例、题例,内容既高屋建瓴,又始终不离教学实际,所谓‘昂首天宇,脚踏实地’,二者兼而有之。”我们有理由相信,《语文教学艺术论》必将成为一部教学经典。

“昂首天宇,脚踏实地”八字,使我想起陶继新先生。他自言自己的学习方法简言之曰“上天入地”:上天,即“读原典”,此为“天书”;入地,即“接地气”,即便退休后的日程依旧排得满满的,采访、写作、演讲,几乎日无所息。这就是一种气象万千的生命状态,让小我的生命融入伟大的事业中。

我曾有幸参加杨九俊老师主持的语文项目。项目组内常有争辩,当丁帆、徐兴元、汪政、王栋生、黄厚江、唐江澎、曹勇军、张克中、徐志伟等名家们辩论得不可开交时,杨老师总会适时收束,而他的总结极为精准,众人皆服。杨先生说话云淡风轻,自有一种大格局、大气度。

这是经典之于他们的滋养,而他们也将在岁月的淘洗中成为未来的经典。其实,我更愿意称陶先生、杨先生为“老师”,不仅因为他们都曾在师范学校教过书,是老师中的老师,更因为他们教会了我如何让经典在内心扎根,如何用生命创造经典。

(作者系苏州中学附属苏州湾学校副校长、江苏省特级教师)

读书漫议

# 研究历史有密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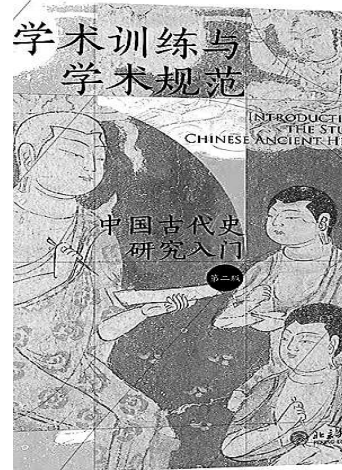
本报记者 梁杰

都说文史哲不分家,笔者哲学系出身,喜欢读历史书,又与文字打了半辈子交道,真可谓融文学、历史、哲学为一体了。近日京城疫情又起,政府倡导居家办公,正好可以在家读读喜欢的历史书。

这几日翻阅了北京大学出版社新近再版的荣新江的《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受益匪浅。喜欢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是一个重视文献编纂的国家,正因如此,具有五千年悠久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从来没有中断过,但中国历史上的典籍著作不计其数,也让喜欢读历史书,尤其是想做一番研究的人无从入手,仅是翻阅、检索历史文献,就不知如何着手,更别提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找到自己想要的的第一手资料了,因此这本书对于有志于中国历史研究的学子来说,无疑是及时雨、脚手架,几乎是手把手将你领进历史研究之门。

时光飞逝,人生苦短。如何在有限的人生中读无尽之书,每个读书人都会毫不犹豫地给出答案:读大家的书,读经典著作。在浩瀚史书中摸爬滚打了40多年的荣新江老师也给出了自己的独特体验,除了“读大家的书,读最经典的书”之外,还给出了自己的读书法:倒读、按主题阅读、集中读一个人。他几乎读遍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出版的所有著作,并认真做了读书笔记。他认为“读大家的书如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做学问就是一代代地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往前移”。做学术研究有时需要“倒读”,倒着读可以看到最新的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书评与札记”一讲,对于笔者所从事的图书推介工作,对于不知如何动笔写书评的广大教师读者来讲,也是非常实用的入门指南。比如,在谈到“书评制度”时,作者介绍了西方学术刊物的通常做法:一本学术专著出版后,都要寄给权威学术期刊,由期刊选择权威专家撰写书评,这样能很好地避免由作者本人或者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把自己写的书或编辑的书送给书评作者,也避免产生人情稿。因



此,在西方,一个学者出版新书后,都会提心吊胆地等待书评的发表,作者不知道书评是在谁在写,更不能干预书评作者写些什么。这种书评由杂志约请专家撰写的办法,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杂志编辑的手中,杂志也把自己发表的书评水准,看作该杂志的学术水准,这样的一种学术认定结果,是杂志要约请权威来写,而不接受书评投稿。这种做法与我们读书周刊目前的做法不谋而合,也坚定了我们这样做下去的信心。

其他有关书评写作的种类、书评内容、书评里的称呼、哪些书值得评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等内容,作者都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很多内容读者可以拿来就用。

这本书是荣新江老师给北大历史系研究生开设的“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课程的讲义,但笔者以为,对于渴望进入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历史爱好者来说,这本书也是一本不错的入门书。大凡古籍、石刻、简帛、文书、图像以及今人论著、刊物都有他们的翻检之道,而对版本与校勘的把握、考古新发现的追踪,则有利于学识的积累和更新。至于学习历史应该从哪些书入手,学术论文如何写作,学术素养如何养成,书中都进行了详细阐释,因此此书不啻为研究中国古代史入门之书。